

日本女作家吉屋信子的上海表象: 以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为主线

徐 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文章以活跃于大正和昭和年间的日本大众女作家吉屋信子各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上海表象为线索,以吉屋的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为关注的焦点,分析了吉屋文学世界里所凝视的上海表象是“虚伪错误”的,而她提倡的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共同幻想”也只是空洞的现实认识的记录而已。随着此种幻想的不断扩张,日本大众对已有一定倾向性的“上海负面形象”的认识也得以进一步的扩大。

关键词: 日本女作家; 吉屋信子; 上海表象; 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 I313.075

文献标志码: A

0 引 言

吉屋信子(1896年1月12日—1973年7月1日)是一位活跃于大正和昭和年间日本著名的大众女作家。吉屋在女子中学就读时因听了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①的演讲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撼,“在成为贤妻良母之前,首先得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及“教育首先是应该培养怎样成为一个正真的人”的演讲词深深地铭刻在吉屋幼小的心里。由此吉屋开始走向文坛,向《少女杂志》投寄自创的和歌和小故事等等。

阅读过吉屋《花的故事》^[1]的日语学习者一定不在少数,但据笔者调查发现,国内对吉屋作品的翻译至今只见于1982年《译林》上的短篇小说《井底》^[2],与同时期日本其他女作家例如林芙美子的翻译作品相比,对吉屋作品的翻译数量不只是少,连论及吉屋的文章也不多见^②。但是在日本,吉屋却是一位著

名的多产女作家,她的作品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有关她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从先行研究的状况来看,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领域:(一)评传;(二)以少女小说为中心的有关女同性恋问题;(三)通俗小说论;(四)战争责任论。

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责任论”的研究领域里,已有冈野幸江等编著的《女性们的战争责任》^[3]、都筑久义的《战时下的文学》^[4]、若桑绿的《战争创造的女性像》^[5]、高崎隆治的《战场上的女性作家们》^[6]和《上海狂想曲》^[7]等。研究者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时期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很少有出色的,都受到日本军部的控制,都以弘扬皇道精神,鼓吹日本将士的“英勇顽强”,以及日本妇女“坚守后方积极支援前线”的内容为主。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模式统一都已失去了作家们昔日的个人特色,有些作品甚至于还不及小学生所作。

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形

收稿日期: 2013-01-08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226109)

作者简介: 徐 青(1971—),女,上海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

① 新渡户稻造(1862年9月1日—1933年10月15日),日本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和伦理哲学家。曾经担任过国际联盟事务次长,东京女子大学初代校长等职。著名的论著有《农业本论》、《武士道》等。

② 略有涉及的研究有,熊飞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文学走向战时化的思考》,新余高专学报,2008年2月,第13卷第1期,第66—69页。王向远《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文艺报2007年4月7日第002版副刊。王向远《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二)》文艺报2007年5月26日第002版副刊。

势急转直下,民生艰难,整个国家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之中。1938年6月武汉战役爆发后,日本内阁情报部邀请日本作家从军,参加攻占汉口的战役。由日本著名作家组成的“笔部队”就这样产生了。1940年10月,近卫文磨内阁的新体制运动,创设“大政翼赞会”。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5月日本国内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日本作家们遵从“大东亚共同宣言”的五大原则,极力鼓吹战争的“正义性”,竞相在杂志和报刊上发表庞大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由于纸张的限制,杂志社也是停刊的停刊、合并的合并,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当局对文字的检阅也更为严厉。日本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变得声嘶力竭,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

吉屋的《战祸的北支上海行》^[8]撰写于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发表于同年11月。这是一个及其微妙特殊的时期,也是日本文学家们的一个转折点。前述高崎隆治的《战场上的女性作家们》和《上海狂想曲》以及和田博文等编著的《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9]对吉屋的作品虽有涉及,但是针对这一时期沦为战场的国际都市“上海”的表象研究却并不多见。抗日战争时期吉屋为什么来上海?对上海又有哪些体验?本文首先就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以及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吉屋小说以及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中的上海表象。

1 吉屋信子与《主妇之友》杂志

2002年日本城西短期大学教授、女性学和媒体研究家长谷川启监修出版了18卷丛书《“战时下”的女性文学》。吉屋的《战祸的北支上海行》被编入第一卷。中日战争的前期日本有四大妇女杂志:《妇女公论》《主妇之友》《妇女画报》和《妇女俱乐部》。其中《主妇之友》的发行一直持续到2008年6月才告结束。最初分三次刊登吉屋现地报告的就是《主妇之友》。这是一部发行数量庞大、富有人气的女性杂志。由于该刊物从1917年创刊以来,刊登的内容都是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记事,因此得到日本中产阶级女性的青睐。抗日战争期间它的发行数量最高,达到163万册,成为近代日本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性杂志之一。

吉屋信子研究专家北田幸惠女士对《主妇之友》的性格做了这样的概括:“《主妇之友》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比较多地刊登了煽动战争情绪的文章。

1934年左右,助长军国主义的文章开始增多。到1935和1936年有关战争的文章就更多了。从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9月开始,直接宣扬战争的文章突显。……吉屋虽然于1936年7月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战舰比叻便乘记》,但是直接参与并站在岔路口上应该是在1937年4月签约成为《主妇之友》杂志社的专属作家之后,正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期。同年10月日本国内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主妇之友》《妇女俱乐部》《妇女公论》《新女苑》《夕晖》等女性杂志与时局相呼应,刊登了不少战争色彩浓重的文章。在这些杂志中,《主妇之友》所拥有的读者人数最多,相应地对日本女性读者的影响也是其他杂志所无法比拟的”^[10]。

由此可以推断,昭和时期伴随着大众化的渗透,女性读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吉屋的现地报告左右着当时日本女性对中国的认识,其影响毋须赘言。

1937年吉屋41岁,由于写作工作过于繁重导致胆结石发作,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不得不减少工作量,因此与《主妇之友》签约成为该社的专属记者。这一选择也把吉屋从书斋生活拉到了战祸的中日战场。从《主妇之友》的目录集中不难发现吉屋与其他作家相比其投稿的件数特别引人瞩目。

作为《主妇之友》社的特派员,吉屋于1937年的8月25日至9月1日被派往中国北方的天津、通州和北京视察。同年9月22日至10月3日被派往上海视察。回到日本后连续三个月在《主妇之友》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10月)、《战火的上海决死行》(11月)和《上海从军护士的决死工作》(12月)等三篇现地报告。这三篇现地报告加上同年吉屋在日本各地的演讲记录合并为《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于同年11月8日由新潮社出版发行。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年,吉屋因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长篇小说《丈夫的贞操》^[11]而轰动一时。吉屋的人气可以与当时热议的话题,“朝日新闻社的神风号”刷新东京与伦敦间的飞行新纪录相对抗。同时,吉屋作为报刊小说作家与当时评价甚高的菊池宽一起被誉为文坛的“双璧”^[12]。这些都是《主妇之友》社为何特意挑选吉屋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员”奔赴战场的原因。在杂志社看来吉屋是最能打动女性读者群的职业作家。通过吉屋女性主体的笔触,把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进行描写是杂志社的用意所在。

从现地报告的时间上来看,其特殊性就在于正

值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战争文学研究的先驱者高崎隆治认为,1938年8月,日本作家们承诺参加由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起的武汉战役“笔部队”^③之前,日本的文学工作者和军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6月武汉战役爆发的这一年之中,日本文学工作者只是以杂志社专属作家、新闻社的特派员等身份来中国、上海等地采访。这一时期他们的报道尚能表述透露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同时,从王向远的《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一文中也可以证实高崎的观点,“这里,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有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与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有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13]

在本文对吉屋的现地报道《战祸的北支上海行》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首先对吉屋各时期小说中的上海表象做一总括。

2 吉屋信子各时期小说中的上海表象

王敏在论文《日本的儿童文学》^[14]中绝赞吉屋信子的《花的故事》是“产生于明治时代萌芽期的‘少女小说’最高峰”的作品。吉屋的处女作《花的故事》发表于1921年,其中有一则题目为“水仙花”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把大清帝国称之为“老大国”,对“老大国”曾经拥有过的繁华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并对亡国的“支那少女”充满了同情。是一部抒情性强烈的文学作品。这本故事集可谓吉屋的成名之作。此后在吉屋的小说中再次出现中国上海表象的是1937年出版的大众小说《丈夫的贞操》。小说中提到,“能在上海虹口吃到寿司”、“在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可以买到中国风情的新郎新娘的洋娃娃”^{[11]34}。吉屋把上海的“有趣”、“人多”、“人力车多”等类型化的形象,通过小孩这一媒介给描述了出来。从日本大众共有的对上海的认识中反映问题可以说是吉屋上海表象的特征之一。

1940年在吉屋的另一部短篇小说《莨》中也有

同样的描述。主人公说道,“伯父在上海拥有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叫我去好好赚一把。”对日本人来说上海只是一种谋生之道,在上海可以发大财。对主人公来说“上海是东方的摩洛哥,有突发事件时最好是逃到那里去”、“晚上和大家一起穿过外白渡桥,去舞厅跳舞……”,“伯父在上海娶了个艺妓做小老婆……”。^[15]这些典型的殖民地的形象特征在吉屋的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重复着“上海发财”、“东洋的摩洛哥”、“逃避之所”,然后是“外白渡桥”、“舞厅”、“上海艺妓”等陈词滥调。可以说吉屋对当时上海的“认识”也正好反映出日本大众的中国上海形象。

吉屋在19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女子教室》中写道,“有4亿人口的支那大陆,一百万人口中却只有十二名医生,实在是太可怜啦”、“半岛的年青女性,现在沐浴着文化接受着教育,变得越来越聪敏。——但是,从桂玉的环境来看,无教育又无知——而且天生的愚钝。——我要想办法,让她成为我的妻子,拯救她教育她,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啊……”^[16]。

显而易见,小说中出现的对“中国”和“朝鲜”女子的描写都是以用来证明日本民族和文化优越于非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民族和文化,日本在各方面比中国和朝鲜都要先进。对中国和朝鲜女子的描写也都是为了彰显日本女性的优秀,中国和朝鲜的女子只是作为衬托日本女性优秀形象的反面素材而已。像“中国的医生很少”、“中国的女性都没有受过教育,很无知”等类型化的重复描述的存在,也可以使我们反过来思考,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状况。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主义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文化这时就成为其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就是非理性的、不正常的。吉屋没有深思她所看到的“上海”这一弱后的他者表象,其实也正是“曾经”弱后的日本社会的反照而已。

③ 1938年6月武汉战役爆发之后。日本内阁情报部邀请日本作家从军,参加攻占汉口的战役。由日本名作家组成的“笔部队”就此成立。成立最初,加入陆军部队的有14人,海军部队有8人,诗曲部队的有2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大众作家久米正雄、菊池宽、佐藤春夫、尾崎士郎和木村毅等人。同时,红顔们也不让须眉,著名大众女作家林芙美子和吉屋信子也先后加入其中,被称为“笔部队”中的“红二点”。1942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就是在“笔部队”的基础上发展成立的。

3 《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中的上海认识

吉屋以《主妇之友》杂志社专属记者的身份于1937年9月23日黄昏时分坐船抵达了上海。为了“安全”起见在已经占领上海的日军驱逐舰的保护下度过了第一夜。吉屋真正踏上上海的土地是在第二天的9月24日。到达上海之后,给吉屋留下最初的印象就是上海的“不洁”。不用说,这是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基本模式。与1862年高杉晋作来沪时,看到上海城内杂乱无章有感而发的情绪如出一辙。也可以反过来说,千岁丸的上海行导致了某种日本人有关上海的表象,对此具有深远影响的表述模式的产生^④。

作为大都市的上海与伦敦和巴黎一样,由于人口的密集等原因必然会引发卫生等基础设施的问题。这虽不能说只是吉屋个人对上海的认识,但是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吉屋眺望上海的视线不是黄浦江两岸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楼群、各种日趋完善超越日本的现代化设施,而是马上把“上海”和“卫生”、“细菌”等联系起来思考不得不让笔者匪夷所思。

“支那的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就像泥水那样流淌着,它的名字是黄浦江……”、“这石竹色的消毒药不仅在军舰上,在上海的公共场所都需要。现在的上海,大家都用心防备着不受战争中的弹丸和看不见的细菌的危害”。又写到“上海的水也和中国北方一样,一滴都没法喝,非得烧开后才行……”^[8]。从该文中可以看出,对一个月前刚去过中国北方视察回来的吉屋来说,对比中国南北方的特点进行描述可谓轻而易举的拿手好戏。在中国不能喝生水这一自然环境特点虽然与日本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不卫生的印象还是作为上海的表象,就此在吉屋的现地报告中登场。

通过女性作家吉屋观察上海的视线可以看出,吉屋也无可避免地写出“不洁、流行病多、落后、应受启蒙”等带有歧视性的言辞。这类文字在文章中反复出现,贯穿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着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17]的感情色彩。中国上海是非理性的、肮脏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日本是理性的、清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吉屋可以在日军驱逐舰的保护下来到上海,可以随便地在租界行走,而此刻的租界已沦为孤岛,上海的民众缺衣少食,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如年。这一景象很好地说明了此刻的中国上海和日本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也体现了在这种

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上海的语言模式。

吉屋又道,“逛了一圈,终于越过了外白渡桥,在法租界的支那难民有120万人,其中50万人无家可归,因为没有钱,日本人如去了那里,就会遭遇不测”、“拉着黄包车的支那人像是在骂人,因为不懂支那语,听不懂他们的谩骂,所以我也不生气。但是,感觉很不舒服,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敌意。……黄包车的后面,用红油漆写着打倒东洋鬼子。难道支那人自以为是西洋人吗?只称日本人是东洋人。恢复和平后,我要再到上海来,还是要坐黄包车,下决心要使打倒东洋鬼子的文字变成亲爱东洋女神”^[8]。

从吉屋对当时上海社会状况的准确把握,并生动地描写了上海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真实景象中,确实可以感受其作为女性作家不同寻常的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吉屋却没有反省中国民众的惨状因何而生?难道不是日军侵略掠夺导致的吗?众多的中国百姓被日军逼迫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落街头,至此才痛恨日本,想要打倒日本鬼子,这就是排日抗日的根源所在,而并非如吉屋所言“排日抗日是中国式教育的产物”^[8]。

当然,吉屋同时也以一名女作家所特有的敏锐视线,仔细地观察着“上海”和“上海人”。在“‘爱国女中’的教室里拾到的女学生的作文”这一节里,围绕着女子教育问题,吉屋不无遗憾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实地叙述了日本与上海同时代女孩子们思想意识的不同点。

吉屋在被日军轰炸倒塌的校舍废墟里捡到的作文的题目是“抗日的基本方案”,作者是优等生高彩英小姐。该作文仔细分析并阐述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和战况,提出以打持久战为上策。

吉屋写道,“在日本,女学生在初中年级是讨论宝塚和松竹等少女歌剧明星的年龄,可是中国的少女们却热衷于谈论抗日问题。这点我们不能不考虑啊。”^[8]显然,吉屋笔下的“高彩英小姐”的形象提示,这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议论上海形象的好素材。也

④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认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萨义德1999:4)。”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虽处亚洲,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对中国、朝鲜等国的搜刮侵略以及殖民情形来看,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也同样的适用于此。

就是说,吉屋是以日本女性所处的环境来判断“高彩英小姐”其人的。吉屋指出:“我们日本的女性,到现在为止,对邻邦中国的女性是不够关心的,难道不是吗?”此外,吉屋反思到,“与中国女学生相比较日本女学生的社会思想视野的狭窄及幼稚”和“日本女学生非现实的少女趣味”等社会问题。

吉屋对他者上海的“认识”反映出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共识。然而吉屋没有料想到,她所祈望的中日长期的相互交流会被日益恶化的战况所绝断。对战争一定会结束的盲目乐观使作者向“爱国女中的优等生高彩英小姐发出了来日的邀请”。作为大众女性作家吉屋也没有忘记展示其女性思想,提出了:“像我们这样脆弱的女性、用笔代替武器来爱祖国”、“我们不是在与支那民众战斗,我们是在与使支那灭亡的政权,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战”、“是替代弹丸的和平的努力——通过笔、通过演剧、通过美术、通过电影、通过科学——各种文化事业——互相协作”,“美英对支那的文化侵略,太狡猾了,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侵略支那的目的”,吉屋的种种宣传,最终在“我祈祷日本的女性、中国的女性,定会越过国境,作为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为了东亚的和平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感慨万端中收笔。对中国民众的“请下一次诞生在日本吧”的重复表述,至此可以说在吉屋的文学世界里所凝视的上海表象是虚伪错误的。而她提倡的“共同幻想”只是空洞的现实“认识”的记录而已。正是由于此种“幻想”的不断扩张,使日本大众对已有一定倾向性的“上海负面形象”的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扩大。

在吉屋发表《战祸的北支上海行》的第二年1938年6月,日本内阁情报部正式邀请日本作家们参加武汉战役,至此,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们与日本政府开始联手,担当了日本政府的舆论工具。吉屋也开始了第三次的从军生活。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日本军部对文学家的创作也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火野苇平说到,“日本军部限制写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七条: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18]

据吉屋的密友田边圣子在《遥远的梦——吉屋信子》^[19]中的叙述,1943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由于日本国内纸张的限制,杂志停刊合并,以及日本军部责难吉屋的文章过于软弱而被禁笔,于是,吉屋

也因此失去了写作的环境。当时日本国内的文学电影虽然都以宣传战争昂扬的题材为主,但是,吉屋没有再创作同一类有贬低、轻视中国的作品。田边评价,此时的吉屋已从时局中脱离了出来,她的作品没有再被时局所影响,是其独立精神的体现。

4 结 语

通过上述对吉屋信子各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及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的具体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吉屋在作品中的他者认识的许多部分是同时代日本人所共有的上海“认识”的再反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众多的作家是作为报刊、杂志社的记者、特派员奔赴战场的。不能笼统地把8年抗战时期日本媒体的所有言论都用“战时下”一词来概括。至少在八一三事变、南京战役时,作家与军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通过媒体有效地利用作家,鼓吹战争的正义性,最初只限于男性作家。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在华北和华中的战场的视察和后方基地的慰问中也出现了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等日本大众女作家们的身影。

日本对战争的欲望通过媒体被聚焦。而日本作家们所提供的各种言论也使其更为表象化,使日本国民被战争所动员。原本作为杂志社特派员的视线应该是具有两义性的,但是,在从军作家的笔下,却只有“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的区别。就这一层面来说,对吉屋作品的变化进行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吉屋《战祸的北支上海行》的一般评价是这部作品对战争和战场的认识缺少社会视角和思维空间,没有抓住从自身状态,文学观根底去再思考的机会。更有研究者对吉屋的《战祸的北支上海行》做出了“追随时局”、“脱离本质的劝善惩恶主义”、“对侵略战争观点的欠缺”、“令人触目的没有抑制的咏叹和呼喊”等评价。^[20]但是,在1937年的时段,我们从吉屋的现地报告中不难发觉,吉屋对上海的客观表述以及对中日和平确实抱着幻想。但是,吉屋却没有反省,作为一名日本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为其开路的就是日本的军队吗。

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是象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那样决意断绝发表自己的作品,还是象火野苇平、石川达三那样在军部容许的范围内执笔“战争文学”?对于吉屋来说已经不是自我选择的问题,由于她的笔触已经跟不上军部的要求而被禁笔。因此,

吉屋也避免了再撰写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实现的所谓“共同幻想”。

对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杂志、报刊等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还有众多有待挖掘的工作,例如今后将针对这一时期杂志《主妇之友》上登载的照片、绘画、插图等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层次分析。

参考文献:

- [1] 吉屋信子. 花物語[M]. 東京: ほるぷ出版, 1974: 65.
- [2] 吉屋信子. 井底[J]. 王丕迅, 译. 译林, 1987(6): 183-188.
- [3] 岡野幸江, 北田幸恵, 長谷川啓, 等. 女性たちの戦争責任[M]. 東京: 東京堂出版, 2004.
- [4] 都築久義. 戦時下の文学[M]. 東京: 和泉選書, 1985.
- [5] 若桑みどり. 戦争が作る女性像[M]. 東京: 筑摩書房, 1995.
- [6] 高崎隆治. 戦場の女流作家たち[M]. 東京: 論創社, 1995: 63.
- [7] 高崎隆治. 上海狂想曲[M]. 東京: 文藝春秋, 2006.
- [8] 長谷川啓. 戦禍の北支上海を行く[M]//戦時下の女性文学: 1. 東京: ゆまに書房, 2002: 107-108, 148, 121, 178-181, 182-183.
- [9] 和田博文, 大桥毅彦, 真铜正宏, 等. 言語都市・上海: 1840-1945[M]. 東京: 藤原書店, 1999.
- [10] 北田幸恵. 女性解放への夢と陥穽: 吉屋信子の報告文学[M] // 岡野幸江, 北田幸恵, 長谷川啓, 等. 女性たちの戦争責任. 東京: 東京堂出版, 2004: 136-151.
- [11] 長田幹彦. 良人の貞操[M]//大衆文学大系. 東京: 講談社, 1937.
- [12] 尾崎秀樹. 吉屋信子[J]. 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1985(9): 46-48.
- [13] 王向远. 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 “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 一[J]. 文艺报, 2007-04-07.
- [14] 王 敏. 日本的儿童文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86(2): 82-87.
- [15] 吉屋信子. 薦[M]//女流作家十佳選. 東京: 興亜日本社, 1940: 272-273.
- [16] 吉屋信子. 女の教室[M]// 長篇名作文庫: 5. 東京: 矢貴書店, 1947: 135-136, 215-216.
- [17]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8] 火野葦平. 火野葦平選集: 第4卷 解説[M]. 東京: 創元社, 1958: 437.
- [19] 田辺聖子. 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 上、下[M]. 東京: 朝日新聞社, 1999.
- [20] 亀山利子. 吉屋信子と林芙美子の従軍記を読む: ペン部隊の紅二点[J]. 銃後史ノート: 復刊二号, 1981: 78-89.

Japanese Women Writer YOSHIYA Nobuko's Shanghai Representation: with In-situ Report *Travel to North China and Shanghai Suffering Disaster of War* as Principal Line

XU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allusion to war responsibility of Japanese medi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Shanghai representation in YOSHIYA Nobuko's literary world is “false and wrong” with Shanghai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of Japanese public woman writer YOSHIYA Nobuko, who was active in Taisho and Showa periods, in various periods as the clue and her in-site report *Travel to North China and Shanghai Suffering Disaster of War* as the focus; the “common vision” of whole-hearte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dvocated by her is just a record of hollo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y. With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is vis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hanghai negative image” with a certain tendency by the public in Japan has further expanded.

Key words: Japanese woman writer; YOSHIYA Nobuko; Shanghai represent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责任编辑: 张祖尧)